

文革四十年专题(一): 广西人吃人

何山这个月会专题时间系列报导 40 年前的文化大革命，第一集讨论当年“人吃人”事件。

[联结收听](#)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为了今年 4 月 9 日大选，在选前造势的一番言论：“去读读《共产主义黑皮书》，你会发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他们不吃小孩，而是将他们煮了，当成肥料来灌溉田地”，触动了中国大陆的神经，40 年前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荒唐事，再次成为海外右翼政党攻击共产党的助证。

中国外交部例牌是出来否认，发言人秦刚说：“我们对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讲话感到不满”，伤害中意人民感情之类。听一下秦刚怎样说？

——“有关讲话毫无事实根据，意大利领导人的言论，应有利于两国友好关系稳定发展。不过，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并没有表示要收回他的言论，他还拒绝道歉。他只承认评论可能“不大得体”，但也称中方的抗议只不过是来自一个“官僚机构”。

贝卢斯科尼说他读资料是引自 1997 年在法国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究竟意大利的民众是否相信他们总理的言论呢？

记者致电罗马，身为基督教徒的王传亮弟兄就说，贝卢斯科尼为了大选，对亲北京立场的左翼反对派政党是不太有善。但致于总理会否撒谎？王传亮弟兄说，“没有证据说出来对自己也没有好处。”

王弟兄三代都是基督徒，本身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八十年移民到意大利后才可以自由的信仰。文革期间，他还是中学生，但对文功武斗还是不能够忘记。“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经历到大除四旧，接下去就是文攻武斗，所以对当时的社会，对国家是带来很大的破坏。”

究竟毛泽东统治时代，中国有没有出现过烹煮婴儿呢？记者再致电伦敦。对中国文化历史颇有研究的吴吕南博士就对记者说，烹煮婴儿他并没有听过，但是文革期间的“人吃人”就有发生。他说：“好多人吃人的事件，我们看很多的报导都看到。人吃人的事件，我相信在很多械斗的事件、党派的斗争中应该是有发生的。是否有婴儿煮成化肥就没有听过，所以我不敢肯定这一点。”

四十年前的文革，吴吕南博士还在香港，广东械斗的惨况，他还记得有浮尸就沿着深圳河漂到香港。他说：“文革的年代我在香港，很多时候有一些浮尸在深圳河漂过来，觉得（大陆）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是在斗争中的。后来红卫兵到了香港，听他们讲，看了很多书，知道很多械斗和杀人事件，甚至有些乡村地方因为贫穷，斗争之后人吃人都有发生。”

记者于是再致电现旅居美国的中国著名作家郑义，郑氏是《老井》及《红色纪念碑》的作者，70、80年代在中国大陆无人不知。郑氏被誉为披露文革期间广西“人吃人”的第一人，这些史料都记载在1992年出版的《红色纪念碑》一书，而该书在大陆是禁书。

“为了要把阶级斗争推向高潮，为了要打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革委会的领袖，当时掌权的一派，煽动群众来斗争地、富、反、坏、右，以及他对立派的这些人……”

郑义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1986、1988年，他两次到广西实地调查，并没有听说有烹煮婴儿的事件，但文革期间的人吃人，10年来连共产党都不敢对他说。他说：“打死了人了，大家觉得人肉据说不错，可以吃，尤其是心和肝，就偷偷的在夜里将死者剖腹，悄悄地拿回去，大家几个人凑在一起煮来吃了……”

根据郑义的调查，文革期间的“人吃人”有的是被默许的、有的是公开的，而目的是要将阶级斗争推到极至。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逻辑再往上推就把人给吃掉。他说：“在斗争会上就等于是群众宣判，比如大家说台上的人都是地主富农，什么坏份子，然后简单的问大家这些人应该怎样处里？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专制是群众的专政，下面就一窝蜂的说杀掉，杀掉！实际上是有组织的，当场就上来，把这些人打倒在地。”

而据《红色纪念碑》的记载，“人吃人”的事件就发生在广西的武宣县、宾阳县等五个县。郑义说，“在很多情况下，人还没有咽气的情况下，就把人的肚子拿开，把肝、心挖出来就吃了。”而心肝吃光了，就连肉也吃了。“后来的这些人抢不到肝和心，就把身体其他部位的肉都割光了，像有些学校吃掉了他们的校长，就是连所有的肉都割光，就剩一骨头架子。”

《红色纪念碑》一书，在1997年已经被翻译成英文，网上购书公司邮购。郑义说，他当年到广西调查，起初也不相信文革期间有人吃人，所以才两度前往广西。但经过采访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领导班子、当地政法机构、公安局、法院、司法部门、监狱服刑中的凶手、有份吃人帮凶、被吃死者的遗属，还有人吃人的现场的证人等等，他确信广西确实发生人吃人。郑义说：“吃人最多的一个县，就武宣县。这个武宣县县革委的食堂里面，都煮过人肉，这种现象是非常令人不可思议，而且是极其残忍的。”

目前，海外有关文革期间人吃人的资料，已经包括了被判刑、被开除出党的凶手的名单，公安机关的判决、审讯、判决书等人证物证。郑义说，他唯一缺乏就是人吃人的现场拍照档案，但事实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他说：“发表《红色纪念碑》这本书，那是1992年的事，没有一个人敢和我来辩驳我的论据。我唯一做不好的，我想也是做不到的一点，是我没有找到当然吃人、杀人现场的照片。因为我后来与很多人了解，第一当时照相机很少，第二场面太恐怖了，没有人敢去拍照，你要拍照的人也把你吃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四十年前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广西的人吃人，目前仍是大陆的禁地，《红色纪念碑》亦是禁书；不过，禁书的作者郑义说，烹煮婴儿的事情他并没有听过。

各位听众，我是自由亚洲电台何山，文革四十年专题(一)：广西人吃人，就告一个段落啦，你当年是否亦身处广西的武宣县和宾阳县，欢迎你透

过电话热线同我们讲你的经历，电话是：108-10-800-728-5617。

文革四十年专题(二)：大屠杀

文革四十年专题“广西人吃人”之后，不少的听众反映从未听过、或者是不可相信。今日，本台再播出“广西人吃人”的续集：大屠杀，由1986、1988年两度现场采证的调查员郑义现身说法，批露大陆致今仍掩盖的文革禁区。

郑义：“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禁止讨论的一个禁区，那像我揭露的文化大革命残忍到这样的一种，超越了人性底线的情况，当然不允许出版、传播。”

文革口号：……主席教育我们要造反，造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我们要革命，革资产阶级牛鬼蛇神的命……

记者：那么可否说一下，你当年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你当时在中国大陆被允许做这样的调查？

郑义：其实不是被允许吧，我作为一个作家，第一不是上级给我派的任务，第二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我到过广西，我对广西当时的情况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后来又听说，文化大革命中广西有吃人吃得很利害，当时我是不相信的，我认为可能是受害一方言过其实的一种控诉，过了多年之后，我发现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当地的政府官员，还有我的一些作家同行都去调查，而且掌握了很多的罪证。所以对于我来说，是很震惊的。

郑义：不是所有的省份都有这个情况，这个说起话来比较长；我是两次，1986年第一次，1988年第二次去广西调查，第一次要掌握一些罪证，第二次想理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发生惨无人道的事情。当然这可以从很多的角度进行分析，包括文化人类学这些……但是他最简单最直白的道理，就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掀起的、所煽动的那一种阶级仇恨，吃掉的人都很准确，不是乱吃的。吃掉的都是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并不是见谁就吃谁，不是！而且局面根本没有失控，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想像的，是在武斗之中大家仇恨太深了，所以捉住人就吃掉了，不是这样……

郑义说，文革中广西的“人吃人”是在成立了革命武装委员会，恢复了秩序之后，在革命委员会默许、组织下进行的，一种人为的、人为煽动阶级仇恨的运动。所以，广西的人吃人运动，也不是孤立的、个别的事件，在广西的许多县都有出现。资料显示，文革期间广西人吃人最闻名的是武宣县及宾阳县，而南宁的隆安县、大新县、上林县、武鸣县、钦州的浦北县、灵山县以及玉林的麦县都发生割肉挖肝煮吃的事件。

大陆官方在文革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曾否定了文革，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积极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当时，唯有广西拒不处理武宣等县吃人肉的事件，地方还称武宣县历来都“有吃人的习惯”。

根据大陆官方已经封存的文革史料，《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广西文革大事记》等，文革中的广西人吃人在1968年的夏季(四月到八月)发生，广西武宣县被吃掉的有100多人，宾阳县惨案有近400

0 人受害。直至事件惊动时任总理的周恩来，周才电令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派部队进驻武宣县，人吃人事件才得制止。

到了文革结束之后，胡耀邦执政期间，胡曾下力展开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1983年，中共中央改组广西党委，武宣县的人吃人事件才得以记录在官方文宪，如《广西文革大事记》等，郑义就是在1986及1988年到广西作民间的实地调查。

不过，事隔40年了，同是“胡”执政的年代，（一个胡耀邦、一个胡锦涛）胡锦涛统领下的中国，郑义广西人吃人调查——《红色纪念碑》在大陆被禁；有关人吃人的广西地方志及记实文宪，仍被封存和保密。

郑义：在广西的许多县都有，而且在某些县数量相当大，我认为，从我的调查来看，这就是毛泽东煽动阶级仇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制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当然不能以此来代表说中国都是到处在吃人。在广西之外，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史学家认为，文革对人性、人格摧残多不胜数，有亲人、朋友互相指证、虐待、仇杀，而广西在1968年的吃人则是毛泽东主政时代最丑陋的事件。当郑义的《红色纪念碑》在海外发行曾引起震动，但海外的知识份子也有认为家丑不应外扬。

不过，郑义说，他所展示的是一种“人类奇观”、“宣扬一部份人可以剥夺另一部份人的人权”的罪行。“像有些学校吃掉了他们的校长，就是连所有的肉都割光，就剩一骨头架子，这种情况是非常残忍的。吃人

最多的一个县，就武宣县。这个武宣县县革委的食堂里面，都煮过人肉，这种现象是非常令人不可思议，而且是极其残忍的。我认为是一种宣扬人类仇恨，宣扬一部份人可以对另一部份人剥夺他们的人权，甚至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式，无所不用其极的这样一种心理，他是一种人类奇观，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

资料显示，参与吃人的都是当年的保皇派，即高干子弟、国家干部和所谓的中共党员；而被屠杀及被吃的，都是造反派及所谓的“黑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广西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凭 1968 年 7 月 1 日晚，被批斗致死，翌日被凶手黄佩农、张继锋等挖去肝，剥去肉，只剩下一副骨架；事后还架起简易炉灶，在学校宿舍用瓦片将人烘烤。官方统计就指，武宣县被吃者有 100 多人。

郑义：“他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宣扬对阶级敌人无所不用其极，这样一个逻辑造成。对这些阶级敌人，你光批斗他还不能解恨，还不能证明你的立场坚定；那你就把他打死，打死还不足表明你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那怎么办呢？还要往逻辑上更极端的推，最后就把他吃掉！因为除了吃之后，你想不出更能够表达出你的仇恨和坚定的其他方式，已经达到顶点了！”

郑义说，在宾阳县，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头，杀害了 3000、4000 人，这个数量相当巨大的，你想想当年这个场面是相当恐惧的，到处到有人被打死，甚至有人被吃掉。那个事情就是跟当时的军管委员会的主任，当地的驻军的一个司长，由他亲自指挥，来做这些时情。后来文革

结束之后，宾阳县的县委和县政府，一直要求惩办这个人。后来被惩办的凶手说我们是犯了罪，我们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做的，那些人都纷纷交出电话纪录、日记本、以及会议纪录，来指证这个驻军司长。”

中共史学家认为，文革揭露了无产阶级专制的残忍，而人吃人则达到人类残忍的极点了，所以对于大陆的当政者来说，文革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所以直到今天文革仍不允许深入的讨论。

文革四十年专题(三)：红卫兵大串连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9个月后，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毛身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前后八次共接见了1100多万人次的“红小子”。在毛的鼓动下，中国河山片一红。“红小子”只知到丹心一片向着毛，在毛有无上权威的年代，任何的权威都可以被打倒，只有毛是屹立不摇。以下是一个红小子的经历，经历如何做一个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文革期间挥舞“红宝书”的红卫兵宣传队。(法新社)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

“我做共红卫兵，当时红卫兵是这样心态的：文革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很羡慕红卫兵，红卫兵成立最早都是以高干、军干、革干子弟为最早一批，以成份为主，在学校是干部子弟，红当当的革命家属，如果有人当过军，家里有一顶军帽；军衣服就很吃香了，当时很羡慕这些人的。”

“当时你穿上军服，在 66 年的时候上街是很威风的，是这样的心态。那时候做贼，都的都是军帽、军服、军皮带、军书包，你背着一个真的很像袈裟一样威风的！”

想起当年做红卫兵的经历，广州的余先生说穿上军装、军服、军皮带，当年是相当令人羡慕的，亦都为红卫兵带来一种权力的感觉，别人对你还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你（红卫兵）去到哪里都是很凶了，人都很怕你又羡慕你的，很有权的！当时是有这样的心态表现出来。”余先生说，为此亦向别人借件军服来穿。

不过，随住红卫兵的成立，批斗也随之而来。大规模的批斗要数得上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所谓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地派”与“天派”的批斗活动，要将“刘、邓”批落下。而在广州，余先生亦都身在出中。“在广州市是批判三家村开始的……然后再批老师、团支部、党支部……由市委、区委、教育部门，派工作队到学校指导文化大革命。”

余先生说，在批斗里面，上级算煽动的仇恨，变的一发不可收拾。“实际工作组是煽动人们批斗老师，与老师之间有仇了人，又煽动学生批老

师，大家互相的仇恨挖了出来，文化大革命各种的思想仇恨，都一盘的滚水倒了出来，在那个年代。”

而当年仍是初中生的热血青年，则是跟着高班学长的使唤。“听高年级的同学，或者工作队，或者老师指使，记录他们说过什么。连好多年的事都拿出来写”？“做过教师是无可避免被学生批斗、批判、打、进牛棚，很多都有！整个广州市间间学校都有。”

而在红卫兵“红小子”的团队里面，也有身份、地位的组织，成份好的就做领导。“杀向社会了，搞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抄家、寺庙、教堂等等。当时成份不好的家庭就很遭殃了。”来成份不好的青年，还被冠上“6 6 9”的称号，押去农村。“将有些学生都有押去农村，强行给红卫兵，街道青年押去农村，这些知青叫6 6 9，广州有几种知青，这种就叫6 6 9知青。”

到了1966年的9月5日，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正式开始。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到北京的师生可以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补助，红小子上京朝圣风起。单是7月底到至8月中，就有71万多人次去北京，时任总理的周恩来还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认为各地学生到北京交流经验是一件好事，但也要分期分批到。“当时中共四个部门发档下来，叫革命大串连，学生就走出校门，大家间间学校互相交流。各乡、各县、全国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了。”



正在北京游行的红卫兵。(法新社)

毛泽东1966年8月18，首次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更是令大串连进入高峰。“坐车不用钱、吃饭不用钱，有接待站帮你解决，当时在广州的广九火车站。是冲火车的。”而一窝蜂的上北京，余先生忆述说还发生了踩死人事件。“几十万人坐火车，广州也发生过踩死人事件，南下北上的都在广州火车站强行冲上去，当时整个交通很混乱。”余先生说，其实当年上京的心态，很多都是旅游性质。“去不了北京，去了上海，实际上是游山玩水，没有什么作用。一般搞运动，都是由大城市的高中生，指导下属的地市级，我们广州就以北京那些下来指导。”

在红卫兵中有阶级，北京的比广州的要高阶，广州的则到附近的佛山等指点江山。“他们就好像当年的锦衣卫一样，很凶的。住穗连续站，是清华、北大、北航很多大专院校的下；我们有部份就下去佛山，肇庆、江门、中山一带，我们大城市的又到小城市的帮他们造反。”

到了66年10月，红小子的大串连，令到中国河山一片红，但也令全国的交通几乎瘫痪，大量的物资积压，连《人民日报》也要在10月2

2 日发表文章，话红卫兵要不坐火车汽车，要徒步行军大串连，并称这样才有“意义”。但有几多红小子会听呢？“串连的时候广东发动步行串连，实际是不步行的，因为串连很好玩的；你去吃饭，市政府还给钱你，拿宣传费。当时六块、八块一个月的生活费。你去到当地是有接待站，给饭票你的。”67 年的 2 月 3 日，中共中央再发通知，要求徒步串连也要停止；同年的 3 月 19 日，全国性的大串连宣告终止。

当年的红卫兵余先生，66、67 年的一切都是相当单纯，去抄人家的家，不会拿人家的钱。闹人家的总部，抢的是笔、墨、纸、蜡纸等等，而一切是为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他说，心态就好像“希特勒的冲锋队”！

文革四十年专题(四)：武斗在广州

经历了一九六六年的大串连，文革开始第二年的中国，在一九六七年兴起一股“武斗”风，到处武斗、停工、停课；南方的香港、澳门、广州亦不未能幸免。六七年的香港，有所谓左派的“反英抗暴”暴动，即“六七暴动”。传统左派在广州运来枪枝、在香港自制炸弹，要在香港展开文化大革命的海外战场。六七暴动期间，“土制凤梨”到处，香港陷于瘫痪，民生萧条。今日，文革四十年后的香港，港人对“六七暴动”深恶痛绝，“六七暴动”的文献在香港可以自由发行。但在大陆，同样是六七年的“武斗在广州”却一纸难求。



1967 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街景。(法新社)

“我们四十周年还不去讲，到了五十周年就没有力气去讲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 20 岁上下，现在四十周年了，就 60 岁上下；文化革命 17 岁的，现在都 57 了……所以我们的时间都不是很充裕了，（要讲的）主要是中共当局按着不给传播的观点和内容……”提起文化大革命，旅居纽约的老广州人刘国凯仍然是义愤填膺，不能再在等另一个五年和十年，要将他所经历的文革在广州出版成书。

刘国凯说，大陆官方对文革采取全面否定态度，定位是动乱；但又禁止民间对文革深入研究，是因为害怕文革揭露得越多，中共就越站不住脚。

“大陆当局一方面将文革定位是一种动乱，但同时不给人去研究，我就认为大陆当局最主要有两种目的：第一种目的是深入研究，就会将官方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很多不光彩的事暴露出来。”有五十万字文革著作的自由作家刘国凯说，文革除了有由毛泽东发动、利用人民打倒刘少奇与邓小平的“政治史”外，还有人民利用文革反抗的“人民史”，这两段历史都是大陆当前最忌讳的。“第二点是人民群众受到逼害后的反抗，这些反抗与当前大陆民众底层的维权活动，有一定的内在联络，所以他就不喜欢人家说。”

“说到广州，当年有什么事？我记忆中深刻的有很多，其中一个文化革命无论哪一个地方，群众都分成有两派：有一派是文化革命前，原来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对于原有的社会秩序持保的态度，”也即是保皇派，或者是总派；而另一派是造反派，或者是红旗派。“另有一些人是他们的社会利益受到某种不同程度的损害，所以他们持一种造反的姿态，这两派在全国是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1967年7月23日，保皇与造反两派，就在广州中山纪念堂附近发生武斗，原因是造反派要在越秀山体育运动场举行集会，庆祝组织成立，而就在队伍经过中山路中山纪念堂的时候，受到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袭击。刘国凯说，施暴的就是由中共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这些人以中共的高干子弟、军干子弟为主体组织起来的，他们对于原有秩序是一种保的姿态，因为他们都是高干子弟，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首先对工人，赤手空拳的工人，准备进入越秀山运动场开会的工人袭击。由于他们有预谋，而工人是没有预谋，所以在这场的武斗之中，手无寸铁的工人、造反派的工人受到了很大的损伤。”

据刘国凯的忆述，保皇派还得到军方的袒护，“后来军区的人到了，当对人进行袭击的时候，军方的人是不理的；等到后来很多的工人从四面八方来到那里，将中山纪念堂包围，军人就出面了。后来的小报还讲了很多，有名有姓的工人是怎样死了，在哪一家厂的……”

记者：刘先生，当时在运动中，你的角色是什么？

刘国凯：我当时在广州税务居郊区工作，一个青年人，工作表现积极，成了单位领导培养的物件，很自然我也是文化大革命秩序下得益的，我是属于红的一类，而且入了团，做了团干部。

刘国凯说，正因为他成了保皇派的一部分，他“深深知道保皇派为什么要保皇，”也了解保皇派发动是发动武斗的原因，“保皇派认为自己成份好、党员多。”刘国凯继续说，“各个单位的保卫科，武装部都是他们的人，武装民兵都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他们来打造反派是以打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来造我们的反，所以在气势上他们是壮的。”

而就在8月13日，武斗中的广州发生了冷血的保皇派开枪扫射造反派的事件，也就是后人所讲的“珠江事件”。“有一红旗派的船到珠江河，被总派的船围着扫射，那船翻了之后，这些人落了水，那些人还要开枪扫射。”而当时，七月底、八月初的广州，兴起了殴打劳改犯的风气，“劳改犯没有人权”，保皇派认为“船是要上岸抢夺”，于是开机枪扫射。“总派就在大船上用机枪扫射，那船很快就翻了，人下水了，在水中游，保皇派就好像打靶一样打！全部人就只有两个能够游水上岸。”据了解，珠江惨案造成了9人死亡。

“为什么下手这样狠呢？因为他们把旗派看成是地、富、反、坏、右，是牛鬼蛇神，是阶级敌人；旗派从来不敢把总派看成是阶级敌人，都是阶级兄弟，不过他们受走资派的蒙蔽，所以旗派打总派不会怎样狠的，总是防卫性的；但保皇派打造反派，就以一种镇压阶级敌人的旗号，所以非常‘狠’的，下水了，还要开枪打靶的打。”

武斗中的广州，同年还有8月8日，由造反派打上省总工会的“八一八事件”，前后即8月23日的中山纪念堂武斗及7月23日的珠江惨案等三起大事。过来人谈过去事，刘国凯坚信要为文革平反，也要为文革中的人民平反。下星期一，我们再有“李一哲大字报”的王希哲，由旅居三藩市的王希哲说当年事，说“文革在广州”。

文革四十年专题(五)：文革与六四

一九六七的中国，国人在毛泽东的疯狂下继续闻鸡起舞，人与人的争斗陷入疯狂，武斗、械斗以见血而告终。在没有人权的年代，人以阶级、出生、血统、成份划分，斗争成为了“改邪归正”、“验明正身”的唯一手段。但是，当年死跟红太阳毛主席的中国新一代，有谁想过毛泽东在巩固万里河山之后，又将矛头转向群众老百姓呢？这一段历史要从一九六七的年所谓“一月夺权”之后讲起。



北京街头小贩出售文革批斗会的瓷像。(法新社)

旅居纽约的老广州刘国凯说，“广州不算重要，青海利害、福州利害，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敬然开枪扫射手无寸铁的造反派组织，青海八一八，打死打伤三百多人，其中有一些是十岁的学生。这样残酷的事，

竟然邓小平的人，要为赵永夫平反！不用奇怪呀，邓小平敢胆搞六四的大屠杀，所以他就能够完全原谅二三十年前的赵永夫在青海杀这么多人！”

一提到文革中毛泽东的角色，刘国凯总是气愤难平，他指毛泽东是将全国的老百姓都愚弄了，“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搞，因为当年想将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清除出去，他还没有达到这些目的，他还需要人民群众帮他做这一点，群众不能够没有的，他还需要利用群众帮他这一点，如果全国在六七年的二月三月，将群众组织都打成反革命，谁还毛泽东搞政治清洗来效力呀！”

根据文革史书《阳谋》和《人祸》的记录，在文革的初期，毛泽东是给了群众罕有的“自由”，让群众成立革命造反组织，借意打击刘少奇、邓小平。到了六七年之后，则是派军队将群众的权力收回来，因而六七年的武斗中，军民关系尖锐。用刘国凯的忆述是，军队明显倾向保皇派，甚至武斗中开枪扫射老百姓。刘国凯说，“中国军方在文革中，动不动就将人民打成反革命，捉来座牢，这与六四中，邓小平要他的军队开枪镇压，是相似的。”

文革在混乱与疯狂之中，刘国凯忆述到，亦都有人民自发争取权益的运动，在文革时间的宽松，亦是中国大陆从未有过的。在广州就1967年5月3日烈士陵园的群众绝食，要求保皇派释放在“三月黑风”中无辜被捉的人，而他本人就参与期中。他说：“军区就是不肯放，僵持不下怎办？红旗以中学生为主的人，去到烈士陵园绝食，消息一传开，旗

派的中学生、太学生，四面八方马上有几十人发展到几千人。”他认为，文革中的人民抗争，与六四民运也有相似的地方。“完全是一种反政治迫害，反政治歧视的、维护自由人、合法权益的正义的行动”

“绝食之中，一天两天过去，很多学生昏到过去，很多医护人员将他们送到医院，很多医护人员都说，你们不要绝食了，你们会死的。但那些中学生说，不行，不放人我们要继续绝食下去，这些情况跟六四在北京是很像的。”

中国官方将文革定为性十年浩劫，对文革是采取否定的态度；但诡异的是官方又不准民间对文革作深入的研究。五年前，文革三十五周年，中共中央曾下令全国不得发表批评文革及批评毛泽东的言论，用意是纪念中共成立八十周年。

前耶鲁大学教授王绍光，即文化大革命中“理性与疯狂”一书的作者，曾唏嘘到：“这三十年里，中国的文革研究谈不上有多大进展。再过三十年，绝大多数文革亲历者将会离开这个世界，将使文革研究失去最重要的资源。”为什么中共不许民间研究文革呢？看来与六四的禁忌一脉相通。

听下刘国凯说，“在文革之中，有毛泽东的文革清洗，毛泽东主要想用这场的社会运动，将刘少奇、邓小平这一批，他不喜欢的清洗去；也有文革镇压，除了老毛的镇压，也有各地的军方、干部，汇同他们的社会基础保皇派来镇压人民；也有文革反抗，人民群众利用这很特殊的历史

时期，共产党内部分裂，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很主要的诉求是反政治歧视，反血统论，实际自己的权益，广州这些更家多。我将他定义为人民文革，这与六四期间，人民群众的反官倒、反贪污、反腐败是相似的。”

再讲广州的文革，不能不提的是后期的“李一哲”大字报。一九七三年，年仅24的王希哲，联同李正天和陈一阳及郭鸿志，以李一哲为笔名，用大字报揭露文革中毛泽东对国民的愚弄和压迫，并直指中共是以社会主义之名，实施法西斯统治。

这篇大字报当时在广州轰动全市，亦流传到海外，但“李一哲”因此也激怒了毛泽东，换来牢狱之灾。王希哲目前是被流放美国三藩市，仍然是有家归不得。忆述当年事，他说共产党是欠了人民一笔血债。王希哲在三藩市透过长途电话对本台讲：“共产党拿了政权之后，共产党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方法，一定要挑起阶级仇恨，来压逼另一部份的地主、资本家及其后代，不但在城市里面逼害得很利害，农村里面也有活生生被打死的，这是共产党欠了老百姓的一笔血债。”

着有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等论文，被受西方学者重视的王希哲继续对本台讲，文革中的诡异之处是坊间广为流传的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文革中受逼害的一群是用造反来争取自身的权益。“特别是受压迫的所谓黑七类子弟，他们不能够明目张胆说反抗共产党，那又要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所以他们反共产党又要打着红旗反红旗。”

王希哲在四人帮下台、邓小平复出之后获得平反，不过八一年再度因为民运入狱，直到一九九三年，北京争取举办奥运，才将他释放，王希哲是身陷大陆牢狱共15年。他说，大陆为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但只平反不危害到管治权威的个案，而他至今仍是有国归不得，一九九六年起被流放到美国至今。

文革四十年专题之五：“文革与六四”，现就告一个段落了。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自杀、失学等等，还有更多是大陆官方不准许民间去闯的禁区，你还有什么冤情呢？欢迎你透过电话热线同我们分享，电话是：108-10-800-728-5617。

文革四十年专题(七)：偷渡潮

在文革混乱的时代，人心求变，“生活无非都是求一个安稳”，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事主对我们讲，“不是所有人都想做英雄”。

先知先觉的广州人，在文革开始之前就开始偷渡了，投奔到一水之隔的香港；后知后觉的，上山下乡后返乡无望的知青，则在文革后期，奋死都要游水离开大陆；当年不知不觉的大陆年青人，则是继续历练文革的磋跎。

“那时候我是初中三，准备高考，当时看到批判《海瑞罢官》，这样那样，文化大革命就开始，尤其是不需要考试，我们学校是学俄语的，听说不用考俄语，觉得俄语没用，不知多开心，连那本俄语的课本都扔了……”

接受访问的是旅居美国，1974年两次偷渡到香港，然后辗转非洲、最后定居三藩市的老广州陈光石先生，文革开始当年他只有15、16岁。“见到社会上有很多大字报，那时不能够说是动乱啦，看到很多大字报觉得很新鲜，自己小孩子一个，15、16岁，那就开始了学校的事。”

不过，糊里糊涂的停课、停学就磋跎了来自知识份子家庭的陈先生的年轻时代，“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我们都是不太清楚的，自己成份好不好？当时心中有数，你说不参加红卫兵吗？人都有一种潜意识是追求自己利益的。我们那时候生存是在一种焦虑中。”

由于“成份不好”，年轻时代的陈先生丧失了与在校同学同等的机会，这也促使他日后加入批斗老师、武斗的行列。“我喜欢画画的，对我人生人印象很深刻，其实很简单，任何一个人画得比我好与不好，都可以参加美工组，但我就不可以。十个人都可以，第十一个都可以。那我就求老师，但老师不给，”也为此被管教过。

在一生阶级党安排的年代下，人没有个人的安排，“想出任何办法都是犯法”，陈先生说“一切都是听从党安排，上山下乡别无选择，亦没有回城政策”，他致今仍对文革中的所有官员持否定的态度：“怎样说否认呢？很多人说周恩来好，我真可以说不认同……你说刘少奇好，刘在1966年5月23日带头去斗朱德，你可以随时找出那些人好与不好。所谓好与不好？定义很糊涂的，你看刘少奇斗朱德，周恩来整刘少奇……所以我对人性失去了信心。”

“我们在海外，有时有些电台都说，周恩来是不是好人？当你参加了一个文化大革命之后，没有一个人是清高的，都互相在整。我说，是粪坑里的粪，你踩你我踩我，都是在扒粪！”

对人性失去信心，陈光石选择了偷渡，离开广州，前后两次，到了1974终于成功。他的选择与留在大陆，继续写大字报的同班同学王希哲是完成不同。“我们对政治的看法是，既然社会是这样，不如就寻找个人出路，所以就偷渡出来。”

记者：偷渡潮会不会跟文革有关？你自己的个案是如何？

陈光石：我觉得当然是一种风潮，你知到我们偷渡是为改变生活，就这么简单！去香港，1974年初到香港。如果当中国大陆的政治与经济不稳定的时候，大批会偷渡。好像1958年粮食困难，1960年很多人涌往香港，很多老百姓都是为求生存。

据介绍，与事主陈先生有相同的背景，目前移居美加的老广州就有3000到4000人，在三藩市湾区就有500、600人。而陈先生原来所在的广州十一中，有先知先觉的在文革之初就偷渡离开大陆了。

“一个同级的朋友，他1958年就跟着父亲偷渡，有很多是先知先觉的，说起来我们是后知后觉罗。偷渡是解决自己出路的方法。”

陈光石：“七十年代的偷渡潮，我相信多数都是知识青年，我曾经第一次被捉回来，在那收容所的密度简直是塞不进人的，如果你去小便，你

是要在人头上爬过去，根本人连睡都睡不到，都是站着过夜。我自己也关了一晚，第二晚就递解樟木头”

记者：那时好像有个市价，偷渡是罚 7 0 0 到 2 0 0 0 ？

陈光石：我们哪来有钱，骨头就有，只能说你哪里来，递解到哪里，罚是一个虚数。我就听到当时，江青去到广东省看偷渡人士，流传两句话，我不知真还是假，一个是“囚期太长”，一个是“囚粮太少”，所以那时很快就放了。

第一次偷渡不成功，六个月之后，陈先生再接再厉。“放出来之后，锻炼身体，又偷渡去，我的朋有很潇洒了，七次落水，又在水面被巡逻艇捞起，（笑说）又是捞虾饺了。

而在广州，即使毛主席号召年青人到大江大河游泳，市政府则是怕怕了，因为当时练水的原因无非是要偷渡。“真的是学习毛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当时毛泽东号召学生到大江大河游泳，而广州市是不给游，不给你到大江大河去游泳。游泳就是要偷渡，想练好偷渡去香港。”

陈光石第一次的偷渡是不成功了，被警犬逮住。“我们第一次很傻的，哪有人帮助偷渡，就在惠州市出发，我们走了六七天以为到了大亚湾……刚好两条军犬换班……其实到了走山十二天之后，人身体发出的臭味跟野兽是一样的，就被咬住了。”

半年之后，事主陈先生再次尝试，涉水七个小时；这次就有惊无险，成功抵达香港，“第二次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又在惠州开始，第六天就到了东坪州，还休息了很长时间，游了七个小时，到了东坪州。上岸后也没有兴奋了。”之后就向港英的警察自首，“有一个有趣的事要告诉大家，一进去坐了一会，突然警察哄一声走过来，立正对我们敬个礼，我们都呆了。他就官式的说，这里是英国皇家水警总部，香港东坪州分部，当你进入我们的地方，你就受到我们水警总部的保护。之后就说，（脏话）是不是肚子饿？那里有东西吃，是青红萝卜烧牛尾，大陆没有的，还是第一次吃到香港的食物。”

在香港一住就十年，陈先生事后移居美国，对住土生土长在美国的儿子，陈先生说，文革的那段历史要如何说起呢？最容易不过，是当年抵垒香港路下的足迹。他说：“我在26年后带着我的儿子，经过大埔码头的时候，刚刚就见到那个码头，一模一样，我都会对我的儿子说，指着那，我就是从东坪州偷渡出来的。”

文革、上山、下乡、偷渡，递解、再偷渡、安居、生根美国……陈先生说，“问心讲，他只是为自己的前途去是打算，他只是普通小人物一个，想生活好一些。”

文革四十年专题(八)：童年阴影

今天我们继续“文革四十周年”专题节目，我们请来现居美国的前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的儿子李少民，回忆文革对其成长造成的阴影。



1976 年，李少民站在他正在画的毛泽东遗像前。(李少民私人照片)

李少民说：文革开始的时候，1966年我还不到6岁。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我当年是在北京景山学校，比较好的学校。可能有些听众也听过，当时文革最开始被打倒的，三家村的其中一位作者，有一位作者叫吴(日含)，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他写了三家村之后被打倒，他的儿子就在我的班里面。

他走在路上，别的同学就问：你是不是吴彰？因为吾彰是他的名子，他吓得不敢说他的名字，“我不是吴彰！”人家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就很焦急地说“我叫彰吴”。然后哈哈大笑，推推打打一顿，就这样！

我因为家在中宣部，当时我记得院子里面堆了一个山，这个山是什么呢？走近一看，就全是书。因为当时所有的书，几乎没有一本书是好书，除了毛泽东选集。外国的书是西方毒草，中国是封建毒草，那你就要把他都拿出来，都烧掉。中宣部的人，干部大概的书要特别多，就堆了一个山一样，就后就烧了。

坟书，是李少民童年的一大记忆。他还记得，当年大院的同窗，看到天荒夜谭之类的读物，是相当有兴趣的，有的还用脚在火堆中将书踢出来。

很快我们都是被赶到乡下去农村去劳动，那10岁的孩子在乡下劳动。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都觉得你这个很浪漫，这么小又不用念书，拿着锄头锄地去，但是当时你想，我们不知到这个事情有结束的！

我就记得很清楚，抱着锄头在地里面，站在地头上，跟我一起劳动的，都是农村的壮年劳动力，你看10岁的孩子跟16、17岁的一起锄地，我又不会锄，很困难！抬头一看，那个地就是看不见头，我想：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但也不能够落后，拼命的锄，锄到晚上睡觉，就根本想死了一样。尿床！尿床又不敢告诉别人，童年就是这样渡过。

李少民目前在美国一家大学教书，父亲是老革命的背景，亦为他在文革的当年，看到和受到与别人不一样的遭遇，他为毛泽东的追悼会画过遗像。1976年9月，毛泽东刚刚去世，身在部队的李少民，就被部队的上司命令要连夜画一幅巨型的黑白的老毛遗像。当时全中国所有人都要为毛而哀伤，毛的遗像用彩色不行，一定要用黑白，黑白才显得伤感，但没有哀伤？挤不出眼泪？又如何是好呢？

李少民说：我后来当兵了，参军了。我们古代有一句话，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为什么呢？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当年绝对不是大家向往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是说，谁谁被征兵了。但我当兵的时候大家都是争破头的，就像入选皇宫一样，争先恐后，生怕当不上。为什

么我可以当兵，我因为会画画，我的美术比较好，当兵就是因为我为画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全国的学校都停了，毛泽东说，学校没有知识，学校的人他们不如农民聪明、不如工人聪明，他们都是一群笨蛋。学校关门以后，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都需要人宣传吗！所以恰恰是会唱歌跳舞的，会画画的到有了出路了，因为全国需要成千上万的人去歌颂这伟大的革命。

李少民回想，当兵之后的很多事，他说当年实际是对年青人一种极大的摧毁。在整理老照片时，在发现一张30年前与毛泽东肖像的合照，十分令人感慨。

他说：我是1975年当兵，1976年9月，毛泽东就死了，当然毛泽东一死，全国就简直是天就塌下来了，可是当时我就觉得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毛泽东是我们的救星，毛泽东是万岁万万岁！毛泽东是不可以死的，毛泽东一死，天就要塌了，你就要非常悲痛，你就要恨不得投河自杀，才能表现出你的感情！但是呢，我在毛主席的关怀下长大，只是觉得越过越贫穷，最后从城市过到农村、从农村过到军队。我们在军队里面就没有饭吃吗！怎样去争取多打一勺饭都是很多心机的。

毛泽东死的时候，李少民一点都不悲哀。他说：我想一定有什么变化，任何一个变化也不会比现在更坏了，不悲哀很可怕，要是被发现不悲哀，就要被批判，被隔离审查！

李少民说：这个时候全国就要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候，举行毛泽东的追悼会，纪念毛主席。北京有大的纪念，我们在各地也要纪念，我们的单位等于是军吗，纪念毛一定要挂一张很大的遗像，但就麻烦了，所有的都是彩色的，那么我们知道遗像不可以是彩色的，那照片印不了这么大，照片要两米多。我在军队里是管画画的，就说“小李，你来画毛主席遗像，这是政治任务，还要很快完成，还不能画坏！”我一听就吓坏了，赶紧就开始画，记得画了是整整一天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已经是没有劲了。这个时候，我的领导过来对我说，“小李，过来我给你照个相”。我想，还有什么兴趣照。他说，“照一张相，历史镜头。”他说得挺对，30年过来，一看还真是历史镜头。

30年、40年过来，与毛遗像的合照，凝聚的文革的历史镜头。李少民说，事后看还再浪漫，也不能没有当年的感情制造，被迫制造出一个对毛有感情的哀伤。

我们在私下的人们都好办，但在公开场合你要哭的！像开各种会纪念，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心里都是，稍为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生活越来越差！生活用的也没有，一切也没有！那怎能还认为，全世界不要忘记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的人民，美国的人民在受苦。那么，我想比我们还苦的话，也相当不容易了。

当年的感觉是，毛泽东的死去一定会带来改变，起码一定会变。而任何一个变都不能再坏了，只能往好变了，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到了最底层了。30年之后，中国是变好变坏呢？李少民的父亲李洪林，在文革之

后被平反，还委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的一职。不过，到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他的父亲受命到广场劝说学生离开，事后又被打成了六四的事件的黑手。一位老干部，老革命在文革的遭遇，下一集我们再讲。

文革四十年专题(九)：翻脸不认人

大陆官方过去对40年前的文革没有补偿，今天更是鸦雀无声；不少在文革中受害老党员的个案仍被长埋在地下，他们的家人都希望有日能重见天日。大陆不少的家庭都经历过大陆翻脸不认人的遭遇，前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是其中一个个案。

出生在1925年，21岁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李洪林，在他的《自传》中曾经说过：“国民党抓我，是因为我要推翻它；共产党抓我，却因为我在维护它。”国民党当年抓不到他，但共产党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将他逮捕，关押了将近一年。不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文革之初，李洪林被他所在的党打成黑帮，而一家人更是早就被弄得妻离子散。李洪林的儿子，现居美国维珍尼亚的李少民对本台粤语组说，“这是迫害，我父亲李洪林先生一直就在中共中央舆论宣传的中心点，从50年代到80年代。看我家，我父母都是很早参加革命的，但是在五十年代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母亲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一个很年青的人，一早就参加各革命，怎会变成历史反革命呢？”

这个无妄之灾，让李少民在一岁的幼年时代就失去了母亲，因为党组织要他的父亲，与妻子划清界线。他说：“她就因为毛泽东说大鸣大放，

要人提意见，他在的大学给甘肃的党支部书记提了一个意见，结果就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之后，党组织就说?一定要离婚，不能怎能够在共产党组织里有前途?1957年母亲被打成右派时，李少民只有一岁。

自此，由1957年到1980年，李少民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母亲，“我母亲被打成右派之后，就被送到甘肃劳改农场，甘肃是很穷的地方，在大跃进的时后更是穷得不得了，所以我母亲的同事在农场几乎都饿死了，她是侥幸活下来。”

李洪林与妻子离婚之后，仕途也好不到哪里去，先后被带上右倾主义，黑帮等名号，李少民说：“这运动就一浪高过一浪，最后我父亲到了文革还被带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父亲自己都说，我已经左得一踏糊涂，到农村被带富农帽子，结果这么左还被打成右派。”

究竟李洪林这样的老党员犯了什么错误?原来是他太过认识中国共产党了。李少民说，“他写了一本书?就中国历代政治运动，从1949年到1989年的政治运动，那书就描述了文革并不是很突然的事情，就是从延安时代，毛泽东对党内异己的批评，他不是通过制度，就是发动群众，挑动群众打另一派搞臭!”“搞到最臭的时候，毛泽东就出来说几句话，这个人是个坏人，火上加油，将这个人整死，历来如此，文革这个程度是到了史无前例。”

文革作为中国历代政治运动的写照，该书在李洪林的笔下是揭露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恶行。文革之后，李洪林得到了平反，在胡耀邦担任中宣

部部长和总书记期间，李洪林还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有着巨大影响，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

而据胡耀邦文革之后对李洪林的谈话，文革所迫害的中国人有一亿，比官方起初承认的 8000 万还要多，也即是，当年每 8 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是文革的受害者。他说：“我父亲也是多年坐牛棚的，这些事情很特别吗？也不是，多的是。文革后期，胡耀邦把我父亲调到中宣部工作，据我父亲跟我讲，胡耀邦他自己统计，在文革中受到牵连的人，各种形式受到过迫害的人，不下于 1 亿人。”

李少民说：“当时中国有 8 亿人，等于某种程式上八份之一的人都受到文革的牵连，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年胡耀邦去世的时候，我们纪念胡耀邦。胡耀邦有一个最大的贡献，他不遗余力地为文革的事情平反，因为他实在太知道，他自个受害不用说了！这伤害了 1 亿人，全世界哪有一个地方这样，1 亿人是半个美国，5 个加拿大呀！”

文革之后，李洪林并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赔偿补偿；但李洪林仍选择为共产党效劳，作为共产党在“思想理论领域”的“主管”。资料显示，他有名言“人民可以选择领袖，领袖却不能选择人民”，“领袖应当忠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要树立民主的权威，破除专制主义的权威”等等。不过，到了六四，另一场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这位老党员，忠心的党员又再身陷牢狱。

李少民说：“到了 1989 年，天安门事件暴发学生运动，中共中央统战部请我父亲和另外十几个学者，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离开，但学生后来没有离开，这我们都知道的。那六四开枪之后，当局又把我父亲这些人给软禁起来。”

当时，李洪林与十二学者发出了《紧急呼吁》，并奉统战部之命到广场化解僵局；不过，就在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 43 年，中共再将他关押了将近一年，罪名“反革命”。李少民说：“就这样给抓起来，说他们是天安门的幕后黑手，这是共产党历来的，你上百万人游行，他脸下不来呀！怎么会有上百万人呢？这些人肯定是被蒙蔽了，被蒙蔽了就要有黑手吗！谁是黑手呢？就是这些到广场劝学生的知识份子。劝学生离开反而变成了黑手，关了将近十个月就放了，有什么补偿呀！”

不少文革的受害者向我们反映，大陆官方对 40 年前的文革没有补偿，需要发起索偿运动。你有没有如前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的遭遇？为党好，为党忙；最后却被党害，这个党对人翻脸不认人的遭遇呢？

文革四十年专题(十)：骨肉相残

在中共以阶级为纲、互相批斗的年代，不少的知识份子、老干部捱过了被带高帽、被送入牛棚的经历，但当他们发现揭发自己的竟是亲生子女的时候，他们是否能还撑得住呢？以下是文革中“党”要你骨肉相残的两个个案……

“在文革中给我最大的震动是什么呢？我当时只有十岁九岁，我哥哥已经比我很大了，大七八岁，已经是一个青少年了，在积极地跟着毛泽东的口号。”讲起文革，被中国大陆被判以间谍罪驱逐出境的美国公民李少民，开口是滔滔不绝。他说，文革之最残忍，是毛泽东要你将革命带到家里面。“文革让你们家里面的人就是互相斗、父母互相斗、父子互相斗、子女互相斗，家里的人都是被他们破坏。”

李少民的母亲在他一岁的时后就被中共以右派的名义流放到甘肃劳改，他到14岁到未见过生母一面，因为组织要求他们与右派划清界线，好好的一个家庭，就此分离。当他与生母重逢的时候，他已经是两个母亲，多了一个继母了，要怪谁呢？

“那时候我哥哥是一个红卫兵，他非常革命，十几岁的一个青年，他不懂。上面就号召要揭发父亲。”留下来的，看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十几岁的哥哥，一头栽进党的号召里，批斗起留下来的父亲。此刻，他的父亲，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再也撑不下去了。

李少民说：“（哥哥）他就给当时的马列研究院的一个副院长写了封信，说我父亲是黑帮怎么办？回信说，你说得对，你父亲是黑帮，你要跟他划清界线，那么我哥哥最大，就把我四兄弟姐妹叫到一起说，你看，这个组织上已经来信了，说我们爸爸是反革命，我们要划清界线，你们懂了没有。”

回想当时的情景，年龄尚少的李少民是被愣住了。他说，根本无从反应。

“听了非常悲哀、难过，也不知到做什么。后来我哥哥打他这封信放在兜里，结果继母给我们洗衣服的时候，掏出了这封信。一看！伤心得不得了！”

“我父亲也非常伤心，我父亲是很坚强的人，天天在外面挨斗，他都没有伤心，他看到自己的儿子都要跟它划清界线，他非常伤心的。”而他的父亲就在那一刻熬不住了。“当然明白不是我哥哥的错，就整个红海洋，全国人都疯了，你能保持冷静吗？疯的人看到冷静的人就像你是疯的一样！”

接下来是另一位被革命“革”到家里的受害人谭先生的故事，谭先生说：“我妈妈是根正苗红的，我外公外婆是干部，之所以我舅舅后来当了红卫兵，能够见到毛泽东，就是因为他根正苗红。”

舅父根正苗红，见到了毛泽东；但谭先生的他的父亲是地主，母亲嫁了给地主；在那个年代，如何是好呢？“他回来之后，对我母亲有很大的压力，希望她能够与父亲离婚，搞到我老妈有一种人性的扭曲。在家，她是跟丈夫分床睡的，但她又不敢回外家。因为她是嫁了给地主，回去之后就影响了弟弟和老爸的前途，所以她不敢回娘家。”

在人性的扭曲之下，谭先生说，他的母亲竟把自己所出，变成了敌人。

“不敢回娘家，她在家把子女当成了敌人。为什么呢？除非我老爸煮饭，如果是她自己煮饭的时候……有一次她煮了汤圆，吃不完，乡下就用来

养猪，她就把汤圆倒到猪盘，倒了也不给我姐姐吃。”“我姐姐当时三岁，我也不过是手抱婴儿，害得我姐姐要爬过去从猪吃的盘子里拿汤圆出来吃。你说，悲惨吗？”

童年的幻影，令谭先生觉得，这个党的确是欠了他很多。17年前的“六四”他就走上街头，反对一党专政。

在文革之中，千万的家庭，因为子女、父母、骨肉的相残变得精神分裂。精神病是文革之后的一大遗祸。熬不过去的自杀身亡，著名的有《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作家老舍、中共元老李立三、北京市副市长吴（日含）等等。没有轻生的，内心转不过弯的，则是更悲哀，有如“活死人”。

李少民说：“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个常务部长就许力群，他的名子跟邓力群很近，实际许力群跟邓力群也是好朋友啦。许力群在文革中被抓到监狱，他是清华的高才生。他就想：关我的原因是我反毛泽东，但他分析是毛泽东错了。不过，毛泽东不能错呀！按照毛泽东的逻辑错是不可能的，他自己绕不出这个逻辑上死结，就疯了，真的就疯了！”

而对于那些走出红海洋，现年50、60的一代来说，李少民形容，当年就正如入了黑社会一样。“参加了红卫兵，也有打砸抢，也有杀人的，后来也就都变成了正常人了，他们经过了这些相等于入过了黑社会又出来一样，那这些人是比较能干的。也有受迫害的人，大多数有远见的，他们一般就觉得自己受的迫害也不怎么，主要是将来不要让国家再做这些蠢事了，当然看得比较长远。”

文革四十周年永远有讲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十集专题到此就先告一个段落了，我们我后讲过文革中的武斗、大串连、人吃人、童年阴影、骨肉相残及文革之后的偷渡潮，也有文革与六四的类同等等。身受其害的文革受难者家属对我们说，期待文革有真正的平反、补偿；但也“不会指望中共对文革有真正的结论”，“中国人与中共一直就有你斗我、我斗你的传统”，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平反只是遥遥无期。

UnRegistered